

中加人民友谊的象征

——诺尔曼·白求恩大夫

乔 国

无论是在战火纷飞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还是在和平安定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在中国的大地上，都传颂着一个伟大的名字，连同一则则动人的故事，而与这名字联系在一起的，还有一个遥远而美丽的国度——加拿大。他，就是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加拿大著名的胸外科专家——诺尔曼·白求恩(Norman Bethune)。是他，在中国和加拿大之间架起了一座隔不断的桥梁，也在中加人民心里树起了一座永恒的丰碑。让我们重新打开这历史性的一页，从头追溯吧！回忆他的过去，认识他一生成长的轨迹。

（一）白求恩在加拿大和西班牙的生活、战斗经历

1890年3月3日，在加拿大安大略省的北部小镇格雷文赫斯特，亨利·诺尔曼·白求恩出生了。白求恩家族是18世纪从苏格兰迁移到加拿大的移民，素有行医、传道和教书的传统，由此尽职尽责的献身精神就沿袭了下来。白求恩的祖父是多伦多市一名杰出的外科医生，他不流于世俗，对事物的看法比较激进，还有着对科学的爱好，成为白求恩童年崇拜的偶像。父亲毕业于诺尔斯神学院，是一名牧师，母亲是虔诚的基督教徒和传教士。白求

恩曾回忆道：“母亲给了我一个传道家的性格，父亲给了我一股要行动、要干的热劲。”^①由于父亲布道的职业需要，白求恩一家接连搬迁，一直到 1897 年才在多伦多定居下来。

白求恩从小就对医生职业怀有浓厚的兴趣。八岁时的一天，家人正聚在饭厅里玩游戏，他却在楼上把祖父留下的一个刻有姓名的外科医生铜牌，钉在自己卧室的门上，并下楼郑重其事地宣布，他以后不叫亨利而与爷爷一样叫诺尔曼，他要成为爷爷那样的医生。接着，白求恩就开始解剖苍蝇和鸡骨头。有一次，由于满屋有刺鼻的气味，母亲跟踪到阁楼，却见他正在切一块刚煮过的牛腿肉，后又将牛骨头晾在后院的篱笆旁制成标本。

随着家庭不断地迁移，白求恩在不同的学校里接受了早期教育。他毕业于多伦多的杰斯·凯察姆公立学校和欧文桑德城的高级中学，后又考入多伦多大学的医学专业。大学是各种新思潮的最先发散地。白求恩受到这里自由空气的熏陶和影响，开始接触并接受了达尔文的进化论。当母亲发现后，便往他的教科书里夹些宗教小册子。顽皮的白求恩就把一本《物种起源》偷偷地塞到了母亲的枕头底下，以幽默的方式予以反击。

大学费用是颇高的，白求恩的家庭并不富裕。他开始勤工俭学，干过侍者、伙夫、伐木工人，也当过教师和新闻记者，与社会进行了广泛的接触，从中体验着人生的丰富多采。特别是在安大略省北部的森林里与那些爽直、乐观的伐木工人为伍，不仅健壮了体格，“青年人的轻浮”在他身上也“显著减少”，他第一次“学会思考关于‘社会’这个字眼了”。^②

① 阿兰·戈登：《手术刀就是武器——白求恩大夫的故事》，三联书店，1979 年版，第 25 页。

② 中国人民解放军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白求恩在中国》编写组：《白求恩在中国》，人民出版社，1979 年版，第 6 页。

这是白求恩一生中美好的一段时光。大学和社会，在他面前展开了一片广阔的天地。未来的一切吸引着他，他有着无数的憧憬和梦想。

但 1914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一切都改变了。这正是白求恩获得医学博士的前一年。他作为多伦多市第十个报名者应征入伍，怀着一腔报国热情和对美丽法兰西的渴慕前往法国，在加拿大第一师战地救护队担任担架员。随军东进中白求恩被榴霰弹击伤，在法英两国的医院休养，并被遣送回加拿大。面对这一破坏和大屠杀的真实场景，白求恩困惑了。在给一个朋友的信中，他说：“这场屠杀已经开始使我感到震惊了。我已经开始怀疑这不是值得。在医疗队里，我看不到战争的光荣，只看到战争的破坏。”^①但在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后，强烈的爱国责任感使他再度踏上战场，加入了英国海军，后又调往驻法国的加拿大航空队当军医。

1918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白求恩在英国退役。他先在伦敦的儿童医院和传染病医院当实习医生，三年实习期满后，又到东区一家私人诊所里当了医生，并抽空周游欧洲各国，观摩了许多外科名医的手术。尽管他对这一职业很感兴趣也比较努力，坚信自己一定会成为一名出色的外科医生，但战争已让他沉重地认识到时世的捉弄和生命的无常，四年的美好时光已一去不复返。在一片空虚和迷茫中，白求恩信奉了英国作家瓦特·佩特的感官享受主义哲学，过起了放浪形骸的奢侈生活。他拼命收售艺术品来赚钱，经常通宵达旦地参加各种刺激性的活动，希望借此抓住有限的时光，体验一切，享受一切。

^① 阿 兰·戈登：《手术刀就是武器——白求恩大夫的故事》，三联书店，1979 年版，第 26 页。

1924 年冬天，他和结婚一年的妻子弗朗西丝前往美国的新兴城市底特律，在贫民区附近开了一家私人诊所。开始时，找他看病的都是穷人，他经常免费医治，生活十分拮据。后来，凭着高超的外科医术，他出名了，也有了钱；随即一个严峻的事实摆在他面前：许多富人为一点微不足道的小病来诊所；最需要医疗的穷人，正是最出不起医疗费的人。尽管白求恩的社会地位已今非昔比，他对穷人的疾苦仍十分关心和同情。他曾到郊外专门给一位住在废旧铁篷车里的产妇接生，当男主人窘迫地拿出仅有的一元钱时，白求恩把钱叠好又塞回到他的口袋里去。第二天一大早，白求恩又买来了婴儿需要的食物、尿布和产妇的睡衣，并为母子二人做了仔细检查。

这毕竟是杯水车薪，失业贫穷的人又何止几个？白求恩也力不从心，往往因为周济别人而陷入困窘之中。在这个生命和金钱被同等看待的社会里，个人的正直和职业道德感仅被当成一种傻头傻脑的温情。白求恩感到很压抑，他开始抱怨社会现实，公开指责一些不称职的同行，并以拼命工作和拼命酗酒来麻醉自己。

1926 年秋天，他因积劳成疾，患上了严重的肺结核病。

白求恩动身回故乡格雷文赫斯特，在卡利多疗养院住了一个月，后又转往美国纽约州萨兰纳克湖畔的特鲁多疗养院。在那名叫“草原”的单幢住所里，白求恩阅读了著名肺结核专家约翰·亚历山大的新作《肺结核外科疗法》，并说服医务人员在自己身上试验这种最新的人工气胸疗法。事实证明疗法是可行的。过了两个月，他的病情已大有好转。

在白求恩极力摆脱死亡的阴影和孤独痛苦之时，他开始了沉思，深刻地解剖自己。他认识到，自己一方面放不下世俗名利的诱惑，一方面又在精神的幻灭中辗转不安，根本不是自嘲的孤独反抗者，是向强大的现实屈服了。由此，白求恩对人生有了新的

领悟：生命本身是人类被赋予的最伟大礼物，一个真正的医务工作者既是生命的探求者，又是生命的给与者。这段经历也使他写下：“并没有多少人有机会面对死亡，并在面对死亡中认识自己一生的真相——然后又活下去。”^①

1927年，白求恩病愈出院。他拒绝了同行们的力邀和金钱的诱惑，离开了底特律。这时，他唯一的兴趣是关于肺结核病的治疗，是要挽救许多奄奄一息的生命，使他们恢复往日健康和正常的生活。为此，白求恩努力工作。他用近两年的时间在美国纽约州立结核病医院进行一系列的细菌学实验，后又回到加拿大的蒙特利尔，在皇家维多利亚医院担任胸外科权威专家阿奇博尔德的第一助手，并在麦吉尔大学兼任任教。1933年春，已成为外科专家的白求恩活跃在医务界。他曾到底特律的赫尔曼·基弗医院担任胸外科代理主任，又应聘在加拿大卡第维尔城的圣心医院担任新设立的胸外科兼支气管科主任，还去其他疗养院和医院为病人做了大量胸外科手术。在改进外科治疗技术的同时，白求恩也开始研究肺结核的有关理论，并在《加拿大医学会学报》和《胸外科学报》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探讨对医学领域的理性认识。

所有这些卓越的成就，使得40开外的白求恩名噪北美。他是医学界很有权威的美国胸外科学会理事会的理事，还被聘为加拿大联邦政府、若干省政府卫生部的卫生顾问和几个疗养院的外科顾问，成为世界著名的胸外科专家。

但是白求恩从来没有忘记自己治病救人的职责，他仍在苦苦探索着，做着各种尝试。当他发现魁北克农业区的疾病发生率居加拿大各省之首时，就撰写了一本揭露魁北克省落后卫生状况的

^① 阿·兰·戈登：《手术刀就是武器——白求恩大夫的故事》，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9页。

小册子，引起加拿大人的瞩目。他不满医生们自命不凡的态度，认为“我们应该像修道士一样，穿起布衣草鞋去工作。我们的目的是保护和救治人的身体。这应该是一种神圣的目的，我们的献身也应该像我们的目的一样神圣。”^① 他建议改革整个医疗制度，取消挂牌行医。

所有的呼吁被证明是无用的。白求恩苦恼地看到，肺结核病人和死于肺结核的人越来越多，贫穷正在全世界蔓延着，这是一种更为严重的疾病。有件事对他触动很大。当他漫步蒙特利尔街头时，亲眼目睹了骑警们挥舞着警棍殴打失业工人游行队伍的暴行。白求恩第一次认识到生存的权利比健康更为重要，血腥的压迫和剥削比疾病更能致人于死地。第二天他就来到蒙特利尔失业者协会，并郑重宣布：“你们送到我这儿来的任何男人、女人、小孩，我一概免费医治。”从此，白求恩开始向广大贫苦人民靠拢，参与他们的活动，自己“觉得已经踏上一条新的道路了”。

这条路把他引向了社会主义国家苏联。1935年夏天，白求恩前往列宁格勒参加国际生理学大会。他参观了许多医院和疗养院，并对苏联的医疗工作进行了一番仔细考察。结果欣喜地发现，苏联公民享受着公费医疗，疾病的预防、病人的复原措施已普遍实行，肺结核发病率相应地大大下降，社会化的医疗制度在这里已经实现。两个月的访问，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回国后，白求恩以客观生动的事实热情赞扬了苏联社会的新气象。他坚信：“创造不是、从来也不是一种文雅的姿态。它是粗暴的、激烈的、革命的……在鲜血后面存在着生的意义。”^②

① 阿兰·戈登：《手术刀就是武器——白求恩大夫的故事》，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89页。

② 同上书，第108页。

白求恩充满信心地开始了改造社会的活动。他在德国流亡画家弗里茨·布兰特纳的支持下,创办了蒙特利尔儿童美术学校,免费给贫民儿童提供学习绘画和发挥艺术创造力的机会。在广泛研究各国公共卫生制度的基础上,他还发起成立了蒙特利尔人民保健会,目的是使最需要医疗的人得到适当的照顾。白求恩被公推为书记,签署发表了《人民保健会宣言》,呼吁人们注意魁北克几十万人的悲惨处境,并提出许多建议来改善公共健康状况,推行社会化医疗制度。

从最初的单纯依靠医术救人到改造社会,白求恩一步步地实践着,坚定地朝着自己的理想迈进。1935年9月,他秘密地加入了加拿大共产党,由一个勇敢的医学革新家成长为一名自觉的社会革命者。至此,他找到了自己的战斗阵营。

这时,国际局势日趋严峻。1936年西班牙战争爆发,德意法西斯政权公开地向佛朗哥叛军提供军队和大量的军火援助,民主的西班牙共和国处于危急之中。加拿大国内的法西斯集团也开始在大街上胡作非为,出现了来自柏林的种族主义的宣传,在蒙特利尔还发生了袭击犹太族公民和抢劫犹太人店铺的恶性事件。白求恩虽然不是犹太人,但他的一系列革命宣言和活动,已使他成为当地法西斯分子仇视的目标。于是,趁白求恩不在的时候,一伙暴徒闯进了他的公寓,不仅捣毁了所有的东西,还在墙壁上涂满了反动标志。

这种无耻的恐吓更加激起了白求恩战斗的勇气和决心。他开始清醒地认识到:“法西斯主义是一种比任何其他疾病对人类危害更大的疾病,一种摧毁千千万万人的身心的疾病,并且它既否认人的价值,也就是否认了一切为人的健康、活力和生长服务的科

学的价值。’^①面对西班牙的局势，他忧心忡忡：“疯狂传播得太快了。……他们到处公开活动了。如果我们不趁着我们还能制止他们的时候在西班牙制止他们，他们将来就要把全世界变成一个屠宰场。’^②

机会终于来了。加拿大援助民主西班牙委员会在多伦多成立，并得到了许多传教士、工人领袖和广大加拿大人民的支持。委员会决定派一个医疗队到马德里去，作为援助西班牙共和国的第一个行动。他们一致认为，在全加拿大最合适的队长人选是诺尔曼·白求恩大夫。在经过一番冷静的思考后，白求恩同意了，他终止了在国内发展的考虑，也暂时放下了正在从事的改革事业，立下遗嘱，率领医疗队奔赴西班牙战场。

1936年11月3日，白求恩一行来到战火纷飞的马德里。在这个即将陷落的城市里，共产党人联合社会党人建立的第五联队正领导着西班牙人民英勇奋战，由世界各国民主人士组成的国际纵队也以鲜血誓死捍卫共和国。白求恩深深地为这种同仇敌忾的情绪所感染，他不满足于在医院或国际纵队中当一名外科医生，而是渴望寻求以最好的方式来组织加拿大对西班牙的医药援助。他从军医院、救护站和前线得知，战时救护中医疗机构最急需解决的是输血问题，很多伤员由于不能及时得到血液的补充而在路上或手术中死去。于是，白求恩提议组织一个流动输血队，使医护人员尽可能接近前线就地施行输血。

这是一个大胆的设想，白求恩坚信这一计划能够实施。他尽力说服了卫生部门的负责人，并得到西班牙政府的批准。在亲赴巴黎和伦敦采购了必需的医疗设备与器材后，白求恩在维尔格拉

^① 阿兰·戈登：《手术刀就是武器——白求恩大夫的故事》，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2页。

^② 同上书，第131页。

大道上正式建立了西班牙—加拿大输血服务站。开始工作时，他曾为血源问题担忧。但在电台、报纸予以报道后，两千多西班牙群众纷纷涌向输血站，排队等候献血，这使他很受感动。12月23日白求恩在大学城战壕试行了第一次输血，成功地挽救了12名伤员的生命，创造了医学历史上的奇迹。此后，他又在前线采用这种输血方法，取得了良好效果：伤员的死亡率大大降低，有些战区甚至降低了75%之多。作为“第一个把血库送到战场上去的医生”，白求恩的创举不仅轰动了整个西班牙前线，后来在二战中交战国双方都采用了这种方法。

进入1937年，佛朗哥叛军在南方发动了一系列猛烈的攻势，输血站的工作任务更加繁重，白求恩把输血工作的范围扩展到了最近的前线。他冒着敌机轰炸的危险，运载着各种医疗器械和储备的血液，出发到前沿阵地马拉加。这时马拉加已经陷落了。从马拉加通往阿尔梅里亚的崎岖公路上，成千上万的难民扶老携幼，在炎热、饥饿和疾病之中疲惫地奔走着。白求恩奋力地把这些无家可归的人们运到阿尔梅里亚，四天四夜没合眼。随后该市又受到法西斯飞机的狂轰滥炸，城市变成一片废墟，人员死伤惨重。他悲愤地把这些惨痛的见闻写成日记，以《马拉加—阿尔梅里亚公路上的罪证》为名在巴伦里亚用英文、西班牙文出版。

这件事对白求恩的震动很大。“西班牙是我上的一个伤痕。……这是一个永远不能愈合的伤痕。这痛苦永远会留在我心里，使我记起我见过的事物。”^①他第一次真切地体会到“消灭法西斯”这个口号的深刻意义，为了纪念阿尔梅里亚，白求恩发誓要克服自

^①中国人民解放军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白求恩在中国》编写组：《白求恩在中国》，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3页。

己所有的弱点，像一个战士那样战斗和生活。

1937 年西班牙的军事形势进一步恶化。德意法西斯继续以军队和军火供应佛朗哥，英法等西方国家在“不干涉”政策的幌子下对西班牙共和国实行禁运，双方力量对比悬殊，民主共和国的阵地越来越小。第五联队的领导人康特雷拉斯召见了白求恩，说明面临的严峻形势，指出西班牙是否获得军事援助将对战争起决定性的作用。白求恩意识到：当前帮助共和国的最有效办法是回北美发动一个要求取消禁运、大力支援西班牙的群众运动。

1937 年 6 月 18 日，带着西班牙人民的重托和一部反法西斯的战争影片——《西班牙的心脏》，白求恩回到了蒙特利尔。成千上万的人们热烈欢迎这位战争英雄，当地新闻界也详细报道他的工作情况，并醒目地和“那些改变着历史发展进程的事件”排在了一起。他无暇顾及这些荣誉，渴望以自己在西班牙看到和经历的一切“去唤醒那些酣睡的人们”。^①

在蒙特利尔皇山竞技场举行的万人集会上，白求恩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讲。他诉说西班牙人民的勇气、信心和作出的牺牲，抨击了德意法西斯对西班牙的侵略及各西方国家的绥靖政策，揭露了德意假借“共产主义的威胁”搞法西斯侵略的真面目，在听众中引起巨大反响。以后的七个月，白求恩开始了横贯北美大陆的长途旅行，他放映影片《西班牙的心脏》并作巡回讲演，得到了许多道义上的支持和经济上的援助。

在旅行即将结束时，白求恩向全国公开了共产党员的身份。这不是一种姿态而是显示出了一种行动的必然性。“我拒绝生活在一个制造屠杀和腐败的世界里而不奋起反抗。我拒绝以默认或忽视

^① 阿 兰·戈登：《手术刀就是武器——白求恩大夫的故事》，三联书店，1979 年版，第 198 页。

职责的方式来容忍那些贪得无厌的人向其他人发动的战争。’^① 面对朋友们提及共同度过的美好时光,他坦率地承认:“没有人比我更清楚欢乐、刺激、交游……的诱惑。我知道我自己的弱点!但是对于我来说,那些日子是一去不复返了。我决不再受它们的诱惑。未来看上去是既寂寞又危险的。’^② 他终于挥挥手,坚决与过去告别。

宋庆龄曾说过:“任何时代的英雄都是这样一种人:他们以惊人的忠诚、决心、勇气和技能,完成了那个时代放在人们面前的重要任务。”^③ 白求恩就是这样一位英雄,他的成长历程塑造了他特有的性格。

白求恩从小对任何事情都有一种强烈的好奇心,并富于冒险精神。他家在多伦多定居时,他才七岁。有一次跟母亲上街买东西,白求恩溜走了,过了好几个小时被一个警察送回家。母亲焦急地问他是怎么回事,他却淘气地说:“我想知道迷了路是什么滋味”。在故乡格雷文赫斯特度假时,白求恩连拽带爬地去捉停在悬崖顶上的一只蝴蝶。带着胜利品返回后,还煞有介事地教训吓呆了的弟弟:“捉蝴蝶有两方面,首先是捉,其次是蝴蝶本身。”在另一次全家的休假中,白求恩看到父亲横渡蜜港湾,第二天自己就跳进了大海,差点淹死。但他毫不畏惧,第二年就轻松自如地游过了港湾。

白求恩的这种冒险性格注定了他“真正是一个为那种要去体验和丰富全部生活的迫切需要所驱策的新文艺复兴时期式的人

① 阿·兰·戈登:《手术刀就是武器——白求恩大夫的故事》,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201页。

② 同上书,第198页。

③ 同上书,第1页。

物^①。长大以后，他养成了一种战斗精神，对陈腐的思想或书呆子式地接受已知事物的态度进行毫不留情的批评，在医学研究上也一再提出引起争论的问题。为了实现他的种种设想和技术革新，白求恩更是富有斗争性，有时候，在他周围的人看来，他甚至让人受不了。

白求恩还有着坚定的意志。当他从生活实践中认定一个真理时，他会千方百计地去探索、去追求，任何诽谤和污蔑，甚至来自整个社会的反对，都不能动摇他为之奋斗的决心。一个同事曾戏谑他像骡子一样地固执，另一个同事则把他描述成“一个加拿大的甘地”；尽管在斗争的方式——暴力或非暴力上存在差异，但两人都是意志坚定不容易被说服的人。

白求恩还是一个富于创造性的人。他常说：“一个外科医生，如果看不见大自然和世界送到他面前来的启示和答案，就应该去挖沟，而不该屠杀人的身体。”^② 当他对某种医学技术、方法、器械不满意时，就去探寻新的改进途径。白求恩革新了肋骨剥离器、牵开器，发明了新的人工气胸器械和肋骨剪，创造了胸膜涂粉法，许多医疗用具都以他的名字命名，颇有名气的费城毕林父子国际器械公司还和他长期签定了专利合同。

白求恩勇于实践的精神也是令人吃惊的。当他是一位病人时，曾冲进医务人员的会议室，大声宣布“我欢迎危险”，提出由自己首先验证当时尚无把握的人工气胸疗法。作为外科医生，任何在病人身上做的试验，他都首先在自己身上试行。他曾从腋臂里抽血注射进肺里，以测试爱克斯光照片的显示效果。一位病人死于无名病症，白求恩就把病人肺里发现的奇怪异物抹在了自己的

^① 阿兰·戈登：《手术刀就是武器——白求恩大夫的故事》，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6页。

^② 同上书，第70页。

耳朵上，来验证这是不是结核菌。在一定程度上，他既是医学上孜孜不倦的研究者，又是富于牺牲精神的实践者。

白求恩爱憎分明，性格直率，不时地做出一些惊人之举，有时候就难免被人视作傲慢、暴躁、不通人情。在社交场合，碰到不喜欢的人，他会毫不客气地扭头就走；对于专爱吹嘘自己职业的同行，白求恩喜欢说外科医生和铅管匠没有什么区别，只是他并不总像铅管匠那样地熟练。一位朋友曾说：“认识他这样一个人实在太累人”；学历文凭和各种褒奖证书，常常被人醒目地挂在客厅里作自我炫耀的东西，白求恩却贴在卫生间，以表示对名利的蔑视；他从来不在乎钱，对他来说，这无非是交换的媒介而已，他慷慨地买自己喜欢的东西并乐于和朋友们共享，还常常购买无名艺术家的作品，以表示对他们在贫困中苦干的支持；他用粗鲁的话嘲笑世道人心，以无情的讽刺来粉碎所谓的派头和体面，并且“对于渴望干的事，他往往期盼一夜间就能实现。他常常对不能与之有效配合的助手大发脾气”^①。从本质上说，白求恩“首先是这样一个人：对人民怀着无限的热爱，对扰乱生活的人们怀着无限的憎恨，对于他和别人可以创造的未来怀着无限的信心”，并相应“继承了探索主流的人们所留下的工作”^②。

白求恩是一个集多种性格于一体、复杂矛盾的人。但作为医生，他了解自己的责任，理解病人的痛苦和渴望。在病房里，他永远和颜悦色，仁慈如慈父，正如他给别人的圣诞贺卡上引用的惠特曼的诗句：“我不可怜受伤的人 我成了受伤的人。”在前线，他眼睛里流露出对伤病员的慈爱，开口第一句总是亲切地称“我

^① Peter Stursberg, *The Golden Hope: Christians in China*, The United Church Publishing House, Toronto, 1987, p. 179.

^② 阿 兰·戈登：《手术刀就是武器——白求恩大夫的故事》，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60页。

的孩子”。当一个患严重肺结核的女病人轻轻地问他：“你肯吻我一下吗？”白求恩毫不犹豫地俯下身去，给这个濒临死亡的年轻人送去最后的感情慰藉，尽管他有可能再次患上致命的病症。

与他一起工作过的理查德·布朗大夫在加拿大广播公司（CBC）制作的一个广播节目中曾说：“白求恩自己夸耀他是一个共产党员。我说他是上帝的圣徒。”^① 护士琼·尤恩也说：“白求恩是一位天生的出色的医生，他的神态能给病人以信心。他心地善良，真如传教士一般，他对人类怀有极大的博爱之心。”^② 白求恩深深地懂得，医生不能光用医药来治病，要用一种更有力而肯定的东西——爱。

白求恩是作为一名胸外科医生得到国际声誉的，但“他在各种不同的程度上也是一个画家、诗人、军人、批评家、教师、演说家、发明家、医学著作家兼理论家”^③。他有着多方面的兴趣和爱好，他的业余生活是丰富多采的。

白求恩十分喜爱艺术活动，并有着较高的鉴赏力。从小他就按照自己对形、色的想法布置房间，他曾进行过买卖艺术品的商业旅行，在家里，他从古董、艺术品和古家具中寻求快乐。除了消遣，艺术更是白求恩表达对人生深深思索、宣泄情绪的一种方式，是一种新的创造性活动。在特鲁多疗养院面对死亡时，他曾画过一套壁画，题名为《一个肺结核患者的历程：一幕九场的痛苦的戏剧》，并配以讽刺诗，表现了对死亡的极大蔑视。在蒙特利尔居住时，他经常从高楼的窗口俯视下面的一切，并把无尽的感

① Peter Stursberg, *The Golden Hope: Christians in China*, The United Church Publishing House, Toronto, 1987, p. 179.

② 琼·尤恩：《中国——我的第二故乡 1933~1939》，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7页。

③ 阿兰·戈登：《手术刀就是武器——白求恩大夫的故事》，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8页。

触涂抹在面前的画布上。1935 年秋天，白求恩在蒙特利尔美术馆举办了个人绘画展，以色彩鲜明、线条雄浑、富有想象力受到了艺术家和评论家的一致赞扬。

除了绘画，白求恩对写作也有着浓厚的兴趣，这是他在大学期间从事勤工俭学活动中养成的。他一生都坚持着这种习惯，以日记、书信、小说等形式，记述了世界的变化和个人工作情况，更留下了自己心路历程的轨迹。他的文字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文笔也十分优美。

白求恩在事业上颇为成功，在婚姻、家庭生活中却不尽如人意。1923 年秋天，他到英国爱丁堡去参加皇家外科医学会的会员考试时，结识了当地的名门闺秀弗朗西丝·坎贝尔·彭尼。年仅 22 岁的弗朗西丝，美丽聪慧、恬静温柔；34 岁的白求恩洋溢着男性的粗犷豪迈与成熟，两人一见钟情，迅结连理。婚后，浪漫的神秘感慢慢退去，虽然两人仍真诚相爱，但生活背景的不同、性格的差异使得冲突不可避免地发生。1926 年白求恩患了致命的肺结核病后，他不想拖累年轻的妻子，坚决离婚了。病愈出院后，工作的忙碌和成功的喜悦都不能驱散他的寂寞和对旧情的怀恋，在一封封热情洋溢的信中，他向远方的弗朗西丝倾诉，共同分享一切的忧伤与快乐，1930 年他们又走到了一起。

再次的团聚使双方格外珍惜这个家。但渐渐地，旧日的冲突重现并进一步激化。有一次，弗朗西丝要白求恩下班时捎点肉回来，她到家后就问起这件事，正坐在地上研究骷髅模型的白求恩心不在焉地回答：“在冰箱里”。弗朗西丝打开冰箱门，却吓呆了，里面只有一条白求恩拿回来作试验用的人的肠子。这是一件小事，却反映出两人冲突的根本性原因。对白求恩来说，工作意味着一切，他献身事业的热情常常影响家庭生活，而弗朗西丝柔弱内向，感情与家庭是她全部的生活和精神寄托，她渴望过一种“正常而

平静的生活”。两人的分歧是一出不可改变的悲剧，他们终于彻底分开了。对此，白求恩感到很痛苦。

但他们始终是好朋友。多年的共同生活，彼此有着深刻的了解。后来，每当白求恩遇到重大问题或精神上感到苦闷烦恼时，他总是找到弗朗西丝，与她商量，向她诉说。每一次弗朗西丝都安静地倾听，并以女性的温情和耐心来尽力抚慰他，帮他出主意。对白求恩来说，弗朗西丝是一付极好的清凉剂，一个在他心目中永远占据重要地位的爱人。

（二）白求恩的中国岁月

1937年6月，白求恩从西班牙战场回国。此时，日本在远东已悍然发动了对中国的侵略战争，法西斯主义的威胁正逐步笼罩全世界。白求恩渴望直接参加战斗，“去过西班牙这个事实并不能给我，也不能给任何其他人以现在静坐旁观的特权”^①。鉴于一批美国医生刚刚启程去西班牙，从全局出发，白求恩认为，“西班牙和中国都是同一场战争中的一部分”^②，中国比西班牙更加迫切需要医生，而他在西班牙的经验可以运用于中国的反法西斯战场。他将自己的想法通知了加拿大共产党和美国共产党，两党同意联合派遣他去中国。这时，国际援华委员会在纽约成立，配合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进行工作，白求恩与委员会取得了联系，主动请求率领一个医疗队到中国北部和游击队一同工作。

1938年1月8日，白求恩率领着由他和美国外科医生帕森

^①中国人民解放军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白求恩在中国》编写组：《白求恩在中国》，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3页。

^②何玉林、刘群：《国际友人在中国革命中》，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16页。

斯、加拿大护士琼·尤恩三人组成的加美医疗队，购买了充足的设备和器材，乘“日本皇后号”海轮从温哥华港启程来中国。他们途经香港，到达当时国民党政府所在地——武汉。在这里，白求恩既目睹了国民党政府“一片混乱和优柔寡断、昏庸无能的官僚政治”，又通过和八路军办事处的联络，见到了一支新生向上的力量——中国共产党。他坚决回绝了国民党政界、军界、卫生界的挽留，决定到共产党建立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去。他相信，在条件最艰苦的地方医生更能发挥作用。

2月22日医疗队离开汉口前往西安。为躲避敌机的轰炸和敌军的进攻，他们不得不从临汾、潼关等地绕道而行，穿越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广大农村地区。荒芜的土地、被烧焦的村庄及颠沛流离、饥寒交迫的难民给白求恩留下了强烈的印象，他诅咒这场战争，更对灭绝人性的日本侵略者充满了愤慨之情。行程是危险而忙碌的，医疗队曾一度与延安、纽约、汉口都失去了联系，一些西方新闻记者纷纷报道白求恩已在中国内地被日军俘获杀害。

一个月后，白求恩一行到达西安，结识了另一位支持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进步人士——美国著名记者、女作家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几天后在延安，他们受到了八路军代表团的热烈欢迎，并得到了毛泽东主席的亲自接见。会见是十分愉快的。他们从西班牙谈到中国，谈到前线在医疗方面的需要。白求恩建议利用他带来的一批医疗器械组织战地医疗队，到前线去就近医护照顾重伤员，并郑重保证这是救助伤员最有效的方式。毛泽东对他提出的伤员立即手术将有75%的复原率很感兴趣，表示会大力支持他的工作。整整三个小时的会谈，双方达成了共识，决定由白求恩组织中国的第一个战地医疗队。白求恩十分兴奋，他认为毛泽东“是一个巨人，他是我们世界上最伟大的人物之一”。

在延安，白求恩参观了这个被誉为革命圣地的城市，并访问